

ZHONGGUO DANDAI WENHUA SHUXI DAXUESHENG DUBEN

王得后 主编

# 探索鲁迅之路

中 国 当 代 鲁 迅 研 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03893

大 学 生 读 本 中 国 当 代 文 化 书 系

# 探索鲁迅之路

中 国 当 代 鲁 迅 研 究



王得后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王得后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 · 大学生读本)  
ISBN 7-303-02179-5

I . 探… II . 王… III . ①鲁迅著作-研究②鲁迅(1881~  
1936)-人物研究 IV . ①I210.97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62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8.125 字数:376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23.00 元

#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编委会

## 顾问

钟敬文	费孝通	启功	林庚
侯仁之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陈原	林林	黄苗子	郁风
丁聪	贾植芳	于光远	周汝昌
魏荒弩	吴祖光	范用	郭预衡

## 编委

季羡林	张岱年	牛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蔡仲德	宗璞	惠牧	黄宗江
黄宗英	袁鹰	戴文葆	谢维和
戴家干	常汝吉	马新国	苏渭昌
阚延河	李国文	刘梦溪	高莽
母国政	朱正	柳萌	谢冕
王得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张思之
舒乙	张抗抗	斯妤	邓九平

总主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张岱年 邓九平

## 总序

也许是得之传闻，也许是自己杜撰，《淮南子》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不过把言语记录下来罢了，怎么会这样乾坤震动？天为谁雨粟？鬼又为什么夜哭？大概是“苍颉，黄帝史”吧？惊天地泣鬼神的，是历史，是信史，是心史。

虽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非事实，盖二十四史也罢，二十五史也罢，自有文字而迄于今，乱巨贼子成堆，成串，层出不穷，不计其数。他们谁惧怕过《春秋》！就是皇帝，像煞有介事，说什么“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还有多少智囊献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结果呢，改朝换制，改朝换代，依然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思想家透彻：“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然而，关心民瘼，关心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的读书人，毕竟能够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感佩于太史公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我们编辑“中国当代文化书系”的根由。

文化决定于生活，又成为生活方式的规范，最能够显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生活的理想与生活的实

况。这又是我们选择文化的原因。

而 20 世纪的中国，旋转乾坤的历史性大事莫过于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新中国的建立。到本世纪末，正是所谓“知天命”之年。前此的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牙牙学语的幼稚可悯，“有志于学”么？“而立”了么？“不惑”又怎样？瞻前而顾后，也足以鼓舞觉醒的人们坚实地前行。

各卷的编者，都是专攻本行的好手。俗话说：“肺腑而能言，医师面如土。”内行人所选，感同身受，大都“肺腑之言”。而雅言呢，《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鲁迅认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已；各人有已，而群之大觉近矣。”我们不敢懈怠，也决不不懈怠，谨以这信史、心史，贡献给我们的读者。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编辑委员会

2002.11.10

## 导 论

### 一

这是一本鲁迅研究论文选集。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止于 1999 年终结，凡 50 年。篇幅约定为四十万字。本来，任何选本，在编者多难免遗珠之憾。何况鲁迅研究论文，向来数量曰大，而又以半个世纪时间之长，四十万字，实在是挂一而漏万了。然而，《老子》有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其致之。”惟愿此书所选，近于得一，庶几对得起读者，对得起 50 年间的鲁迅研究。

鲁迅对于“选本”，多有平议。如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又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因之，鲁迅甚至断言：“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但就事论事，他也以为“评选的本子，

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既然熟知鲁迅对于“选本”的意见，按说我不应该也来搞什么“选本”，尤其自知自己的眼光迹近于豆，搞出一个‘文人浩劫’来实在是罪过。但我想，当我把鲁迅对于“选本”的平议抄录出来，奉呈于读者面前，先打一预防针，不致于中毒，为了省便，翻翻这本选集也是可以的吧？

将近 20 年了。我说过，我身在鲁迅研究的游涡之中，只是“述而不作”，是“很幼稚”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研究鲁迅思想首先要研究清楚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这些思想的性质，评论它的是非，衡量它的高低。”这也就是“从鲁迅出发”的意思。约略同时，王富仁先生提出鲁迅研究应该“回到鲁迅”，深受同行赞许。这，也包括我在内。在选编这个集子的时候，要说有什么标准，也就是比较接近鲁迅，大抵显示研究的轨迹吧。

## 二

鲁迅研究不始于新中国的成立，但新中国的成立的确开始了一个鲁迅研究的新时期，或曰新阶段，是值得从此作一个“断代”的分析的。

鲁迅最早发表作品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 1903 年，到日本留学的第二年，有《斯巴达之魂》、《说钼》，译文雨果的《哀尘》、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

文艺与科学、创作与翻译都两者兼而有之。待到 1906 年 3 月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弃医从文，第二年即撰写《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又一年陆续发表于留日学生编辑、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这一年又撰写《破恶声论》，发表于同年十二月《河南》月刊第八期，但“未完”，不知是未写完还是未发表完。1909 年出版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两册之后，于八月结束留日生活回国。这一时期鲁迅是十二万分孤独而寂寞的。他的文字，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无论是文艺还是科学，都毫无反应，一如“叫喊于生人中”，没有赞和，没有反对，遑论研究。而那《人间之历史》等五篇文言文论文，实在是极重要的呐喊。在中国，提出了与立宪派、革命派迥然不同的强国主张，这就是“根抵在人”，“首在立人”；在个人，已然奠定了后来习称为“鲁迅思想”的基础，包括思想的核心，元点与框架，以及哲学根基。然而，没有感应的神经，没有卓识的慧眼。

不过，这也是时势使然。在一个忙于暴力革命的时代，文学——文化界倘没有与暴力革命一体的大动作，是不可能引起社会关注的。待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成功，一个以推倒人身依附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旧文化，建设人格独立的，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为宗旨的运动勃然兴起，鲁迅也投身其中，以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显示新文学的实绩，以《新青年》上犀利深刻的杂感显示新思想的力量的时候，鲁迅也就脱颖而出，成为读者和文学批评者注视的亮点，并且生前死后，

光辉永驻；对于论敌也是刺眼的电弧光。

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研究是各是所是，各非所非，自由自在的。不仅赞同的与反对的有着激烈的交锋，就是赞同的一方，也见仁见智，各说各话。1927年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以血腥屠杀实行“清党”，鲁迅无比痛恨这种比“三一八惨案”“残酷险狠”千百倍的罪行，乃与国民党决裂而日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鲁迅研究开始进入国共两党斗争的框架。

自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到1921年开始连载《阿Q正传》，到1923年《呐喊》出版，读鲁迅作品而大加赞赏的文字即源源不断。“礼教吃人”成为震撼人心的流行词语，《阿Q正传》甫连载到第四章，茅盾即指认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此后大体成为共识，而“阿Q相”也提出来了，“阿Q”又成为一个惹人爱恨交加的流行诨名。鲁迅的小说有“杰作”（汪敬熙语）。鲁迅的艺术“高妙和伟大”（杨邨人语）。“鲁迅是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张申府语）。鲁迅“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俄国王希礼B. A. Васильев语）。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总结道：“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个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对于鲁迅的思想，既有“托（尔斯泰）尼（采）思

想”一类的比拟，又有“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名望和“思想界先驱者”的广告。

20年代以后，鲁迅日益受到文学青年和青年学生的拥戴。组织未名社莽原社成为骨干，或被视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不过是《语丝》的经常撰稿人，就为论敌指为“语丝派首领”。当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倡导“革命文学”的时候，也以鲁迅为主要的祭旗者，作为“二重的反革命”加以扫荡。待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拥护者以为“盟主”，反对者攻击他因“领袖欲”而堕落。

鲁迅生前最具影响力而有权威性的评论，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因为它的理论性分析与概括，因为作者曾经是中共中央领袖。他的最主要的和被广泛征引的结论是：“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原有着重号，引者）

鲁迅逝世以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提升到空前崇高的地位：“而鲁迅，就是这个（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革命圣地延安一批文艺工作者信奉鲁迅，继承鲁迅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精神，认定“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一敏感而意义深远的题旨，作了巧妙的解释和深潜的批判。这与《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论断构成了一个总纲，而以后者为把握与实行这一总纲的钥匙。

### 三

新中国的成立使鲁迅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的确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

这是因为1943年3月，毛泽东被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直至逝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主席的权威日益攀升，直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思想也攀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鲁迅论也就成为鲁迅研究无可争议的无须质疑也不准质疑的指针。《人民日报》在30年间发表四个纪念鲁迅逝世的社论，这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在数以万计的文学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举措。鲁迅研究在这一时期构成为一个时代。

这一个时代的鲁迅研究者是鲁迅的朋友、“战友”、学生等同时代人物和他们的学生。他们中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真心爱戴鲁迅的人，他们认真读鲁迅学鲁迅，以空前的热情进行理论思考，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成果。但

是，他们的鲁迅研究是和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思想改造的或一种汇报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或一种表白。

这一个时代的鲁迅研究必须与时代的步调保持一致，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思想政治运动。而鲁迅本人，他的经历和他的著作，的确为这样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鲁迅生当中国社会历史性大转型的关头。这一大转型因戊戌维新百日失败而失去了和平改制的契机，转为流血的革命改制，所谓“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这是一个痛苦而复杂的时代。外部是列强步步侵略，而政府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去辽阔的国土，赔偿巨额的银两。鲁迅诞生前七个月，是《中俄伊犁条约》。4岁，中法战争，南洋水师覆没；次年是《中法新约》。14岁，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没；次年是《马关新约》。20岁，英、俄、美、法、德、意、日、奥八国联军攻陷帝都北京，次年是《辛丑各国和约》（《辛丑条约》）。51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52岁，日本侵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鲁迅全家陷入火线之中，5月是“上海停战协定”。56岁逝世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鲁迅诞生于光绪七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几乎读过十三经”。18岁考入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接受新知识，发生戊戌维新。22岁从矿路学堂毕业，“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东渡日本留学，感受革命思潮，参与革命活动，41岁，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秦始皇以来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制，创建史无前例的民国。朝代易改，制度难移。鲁

迅在民国政府教育部内，亲见二次革命，亲见袁世凯称帝，亲见张勋复辟，亲见军阀混战，而后是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民革命，却又在广州亲历国民党背叛合作，暴力“清党”，血腥屠杀。而后是共产党武装起义，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终其一身经历国共两党的武装斗争，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的艰苦历程。在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时代，经历这样复杂的事变，鲁迅认同了时代的主导思潮。第一，从青年时期就认同革命斗争。1903年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即表示：“犹譖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1925年又谈到：“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因之鲁迅一直关心着北伐的进展。第二，鲁迅认同政治的决定作用。1925年他表示“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1926年北伐战争进行中，重申“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第三，当国民党背叛同盟者，血腥屠杀，鲁迅立即与之决裂，公开谴责，痛加抨击；转而同情并支持共产党。国民党愈法西斯化，以党治国，实行“党国”制，鲁迅的反抗愈坚毅而不遗余力。鲁迅临终前纪念自己的老师太炎先生时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又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披露心迹说：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第四，鲁迅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未来的无阶级社会。

然而，在反击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判的时候，鲁迅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即已深刻地指出：“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对于鲁迅上述认同的各点，正需要鲁迅研究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和“为了什么”，以探究属于鲁迅个人独特的内涵。举一个例，比如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932年，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表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1936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不通盘研究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鲁迅的作为和鲁迅的文本，是不可能逼近鲁迅的真相的。鲁迅毕竟是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鲁迅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 30 年和后 20 年。前 30 年是从预设的一系列原则出发，努力论证已有的权威结论如何正确。倘若现成的权威结论语焉不详，于是出现研究的热点。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将鲁迅分割为前期与后期，批判他的前期，讴歌他的后期，那么前期与后期划分在哪一年，迄今未见定论。后 20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政治的需要并为了政治而倡导“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历史的因缘，鲁迅和鲁迅研究深深陷入政治的与思想的攻防之中。30 年的思想改造，30 年的熏陶，一代鲁迅研究者和鲁迅爱好者的养成，各种各样现实利益的发酵与驱动，使鲁迅研究再次出现敏感、激烈、复杂的争辩，乃至依旧诉求于政治的斗争。但坚冰终于打破，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新，新在不再从原则出发而是从鲁迅出发，不再囿于现成的权威论证权威而是回到鲁迅阐释鲁迅，在研究者各自把握的尺度各自设定的范围，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仅赞颂的与辱骂的激烈交锋，就是赞颂的也见仁见智，辱骂的则各骂其骂。虽然依旧有用别一主义、别一学说、别一哲学来图解鲁迅的，依旧有用鲁迅来注释当下流行的思潮和观念的，但，归根结蒂，鲁迅大体上已成为研究的对象，已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自然大抵而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惯是可怕的力量。鲁迅曾作《习惯与改革》，鲁迅研究也不例外。这才见出鲁迅的智慧和他的思想的力量。

最后，我从心底感念前辈和同辈在鲁迅研究这坎坷道

路上的跋涉，他们付出的心血，曾有的快乐，无奈的苦楚，取得的成果。我从心底感谢授权给我采用他的大作的作者或作者的法定继承人。使我得以勉为其难应朋友之约编成这本选集。为了尊重时代的风貌，顾及作者写作——发表时的社会状态，所有论文都从原发报刊全文照录，以存原初的真实。

王得后

2002.3.18于安贞里